

曹植的陶耳杯

——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陶耳杯

吕伟涛



三国·魏 陶耳杯 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耳杯，1951年6月出土于山东东阿的曹植墓。在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为他带来了豪气和才情，也使他遍体鳞伤……

耳杯常用作酒器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与兄长曹丕是一奶同胞。他“生平好乱，长于军事”，从小就聪颖不群，学识渊博，文采绝伦。但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后半生迁徙流离，愤懑不已，虽七步成诗，然“抱利器而无所用”。232年，曹植去世，谥号“思”，意为追悔前过，世称“陈思王”。第二年，其子曹芳遵父遗愿归葬其于东阿鱼山。

据清代《东阿县志》记载：“魏东阿王曹子建，每登山，有终焉之志。后，徙王陈，薨。其子志，遵治命，返葬于阿，即山为坟。”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南19公里处的鱼山西麓，依山凿穴，封土为家，始建于魏青龙元年三月。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葬朝向为坐东面西，墓葬全长11.40米，宽4.35米。1996年11月，东阿鱼山曹植墓被国务院定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曹植墓中所出土的132件文物，大都为比较粗糙的陶器，还有几件石器和料器，没有发现其他什么贵重物品。这符合其父曹操一贯倡导的“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和其兄曹丕在遗令中规定的“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当然，曹植生前的生活是比较困苦、潦倒的，“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死后亦难以厚葬。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件耳杯

为灰色陶质，长约11厘米，侈口，浅腹，双耳，平底，1951年6月出土于山东东阿的曹植墓。

耳杯又称杯、具杯、羽觞，是三国时期常见器物，基本形制是扁椭圆形，弧形壁，浅腹平底，饼形足或高足，口缘两侧各有一个半月形耳或方形耳。这种形制始于春秋战国，是由鬲杯、舟等演变而来，盛行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唐代以后便很少见到。其材质有漆木、青铜、金、银、玉、陶等。其中玉耳杯由诸侯王、列侯等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使用，漆耳杯使用者范围较广泛，上至帝王诸侯，下至一般贵族均可使用。

耳杯常用作酒器以饮酒，《楚辞》云“琼浆密勺，实羽觞兮”，意为用勺子往耳杯里添加美酒；《汉书》曰“酌羽觞兮消忧”，表达的是以耳杯盛酒，饮酒消愁。浙江宁波西南郊西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内书有“宜酒”字样，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内有“君幸酒”，湖南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出土的青铜耳杯上有“张端君酒杯”，皆为耳杯作为酒具的证明。

耳杯也可能是茶器

耳杯除了用于饮酒，还可以用来喝茶吗？

中国人对茶的认识，是从食用和药用开始的。最早利用茶叶“系咀嚼鲜叶，生煮羹饮”，“啜其汤，食其滓”。如今人煮菜汤，亦可视为菜食，故古有茗菜的说法，《晏子春秋》上说：“要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

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系后人收集晏子遗事写成的，是说晏婴在齐国为相时，吃糙米饭，烧三种禽鸟、五种蛋以及茶菜为食。

这种“以茶为菜、以茶为羹”的用茶方式，在我国某些地区仍有遗留。现今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当地的基诺族人仍有以茶为菜的习俗，他们外出打猎或劳动时，带上几节竹筒饭，饿时在野外生火，采集一些鲜茶叶，揉碎后将所带干粮和食盐置于竹筒中，引山泉水煮之，即可食用。另外，在湖南省的桃源县，当地农民有将茶汁和果仁、豆子等混合在一起碾碎后熬汤喝的习惯，名之“擂茶”，亦是“以茶为羹”的遗风。

由此可以推断，在饮茶之风的早期，并没有专门的器具，烹煮茶叶的用具和食器是通用的，或者说食茶之初无定器。作为食器的釜、罐，作为酒器的碗和耳杯等都可能被当作茶器来使用。

茶酒当歌

这件耳杯的主人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国时期，酒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当时酒的消费量远远高于秦汉时期。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人们感到命运难以把握，因而放纵自己，尽情享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饮酒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

建安二十三年，曹植与杨修醉酒后来乘车行驶道中，私开司马门。曹操得知此事后大怒，将负责司马门的公车令处死。不久后，杨修也被杀。为警告曹植，曹操下令禁止诸侯与外人交结往

来。这件事，使得曹植渐趋失宠，政治前途变得渺茫。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困在樊城，曹操命曹植为中郎将去营救曹仁。但是，曹植因为醉酒不能受命，让曹操深感失望。曹操派遣曹植去樊城营救曹仁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役，希望以文采见长的曹植获得军功，但曹植因为醉酒而辜负了曹操的期望。

曹植“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常与四方名流诗酒问答，纵论古今。在当时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借酒广交才俊人士，借酒倾诉离愁别恨；酒为他带来了豪气和才情，使其创作了大量诗文。然而，酒也使他遍体鳞伤。

建安二十五年，是曹植命运的分水岭。这一年父亲曹操去世，兄长曹丕继位。曹植由父王的宠儿变为时时处处受到监视的皇帝的政敌；由“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成为“颇有忧生之叹”的罪臣。在以后的岁月里，频遭兄长曹丕与侄儿曹芳的迫害，历尽磨难，更使他的后半生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

小小耳杯，可以饮酒，亦可以喝茶。而且三国时期，确实已有饮茶的风尚。据《三国志》记载，韦昭是东吴末帝孙皓统治时期的史学家，孙皓好饮酒，常常邀请韦昭竟日饮之。韦昭不善饮，孙皓为了给他解困，偷偷赐给他茶，以当酒饮用。

倘若曹植能像韦昭一样，少饮些酒，多喝点茶，或许会是另一种命运吧？

(作者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朱家洋楼”今昔

庞国翔

在重庆市白沙镇东华街陈家坡有一座朱家大院，当地人称为“朱家洋楼”，是一幢中西风格结合的建筑。始建于清末，原为白沙镇朱氏家庭住宅。它坐东南向西北，两层土木结构，建面1935平方米，分

前后厅和左右厢房。此院曾办过私塾，抗战时期为陆军第十六后方医院、第二陆军医院等。现改为“中师陈列馆”。

“朱家洋楼”朱氏六兄妹的成才故事至今仍然流传于当地百姓的口耳相传中。



朱家洋楼内院

袁凤冰 摄

朱氏“四男两女”六兄妹均出生于“朱家大院”。长子朱芾煌两度留学日本。1906年入上海中国公学。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回国。因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交好，穿校南北，调停和议，有功于民国建立。曾在袁授意下持汪精卫书信到武昌议和，被冯国璋抓获，几乎丧生，为袁子克定驰电所救。胡适日记记载：“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

朱芾煌还是“留法俭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受前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李鸿藻儿子、“中法大学”创始人李石曾委托，他与吴玉章一起回川渝组织四川省俭学会。1919年8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立，经费不足，朱芾煌进行捐款。时全国勤工俭学1560人，而受惠者最多为川渝，包括袁荣臻、赵世炎等近500人。而江津就有43人，为全川之最，此与朱芾煌是江津人关系很大。

次子朱广儒，著名法语教授。1899年，朱广儒生于朱家大院。1912年，年仅13岁的朱广儒与三弟朱广相，四弟朱广才，大姐胡鄂君、二姐夫何鲁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为节省开支，5人使用3份公费奖学金。1927年28岁时回国，先后在法中法大学等北平多所大学任法文教授。

季子朱广相，中国百年西医生

驱者。1902年，朱广相生于朱家大院，毕业于法国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他是当时最早将西医、西药引进中国的著名医学专家之一。朱广相后来曾担任中法大学医学院院长、万桑医院(法国医院)院长。在临床医学上给后人留下巨大财富。他还是妇产科医生，接生大量婴儿，对提高婴儿出生存活率卓有贡献。

四子朱广才毕业于法国名校“综合科技大学”，其后主修桥路工程学。1927年回国，曾先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任教。长期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编著有《运动几何学》等，翻译有《理论力学》等，多用于当时的高校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朱广才携全家离开台湾，返回大陆。朱广才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审核工作。他先后提出早路立交桥的理论与实践，促进了中国进入早路立交桥梁与高架桥梁时代，对现代高楼大厦设计、桥梁设计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长女朱广聪，生于朱家大院。嫁胡鄂君。胡鄂君，曾留学法国，化学家。胡鄂君英年早逝。

次女朱广馨，生于朱家大院。嫁著名学者何鲁。何鲁是重庆大学第五任校长、该校理学院院长。2022年7月13日，重庆大学演出重点项目大型原创话剧《何鲁》，引发戏剧界好评。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江津区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荣宝斋(深圳) 首拍

书斋名陶专场取得白手套佳绩

本报记者 付裕

近日，荣宝斋(深圳)首拍举行，八大专场800余件艺术珍品获得超4.64亿元成交额，成交率达91%。诞生7件成交价超千万元拍品，另有63件成交过百万。其中，书斋名陶专场全场99件拍品全部成交，成交额超1.1亿元，取得白手套佳绩。

在此专场中，出自王一羽旧藏清嘉庆道光年间邵大亨利鱼化龙壶，出版著录众多。拍卖现场以800万起拍，随即展开激烈竞争，多轮较量之后，最终以2200万元落槌，加佣金以2530万元的高价成交。

另外一件千万级重磅拍品出自当代顾景舟制并刻韩美林设计的雨露天星提梁壶，以1466.25万元成交。

当代艺术专场由“国际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两部分组成，坚持学术引领和当代视野，甄选50余幅当代艺术的精品。

当代设计与工艺专场中，五觉斋“大观园”金丝楠木浮雕以80.5万元成交，另外一件五觉斋“湖亭游骑”金丝楠木浮雕以66.7万元成交。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玉雕传承人杨晓雅创作的“蝶恋花”金镶玉香囊则是以57.5万元成交。



故宫博物院藏友尊器外底铸铭文“友”字，为该器作器的家族名号。铭文在外底较为少见。

此尊口下饰叶形纹，颈饰两道雷纹、回纹雷纹，腹部用雷纹作地，上面平雕九只象纹，简练的线条勾画象的形象，九只象首尾相接，生动逼真，足饰瓦纹，上有三个“十”字孔。

友尊



高13.2厘米，口径20.7厘米，重2.72kg 故宫博物院藏

白玉山上“白玉塔”

本报记者 孙晓杰 吕东浩

大连旅顺港畔，有一座白玉山，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白玉山顶有一座“白玉塔”，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玉塔是日本殖民当局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修建的“表忠塔”，以表彰在日俄战争中为效忠天皇而阵亡的官兵，渲染日本军国主义精神。1951年，该塔改名为“白玉塔”。1985年，白玉塔作为“日俄战争遗址和帝国主义侵华物证”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白玉山塔”。

白玉塔能够保留至今，历经不少坎坷，其中有一次是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拒绝才避免被拆除的命运。1953年，前苏联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访问旅顺时，曾提议将白玉塔拆除，在旅顺口东西两侧各建一座比

白玉塔更高的塔，以纪念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卡洛夫、康特拉琴科等俄国将领，被周恩来总理断然拒绝，他认为白玉塔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这个反面教材应该保留下来，以此警示后人；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要居安思危、御侮图强。就这样，白玉塔被保留了下来。

白玉山海拔130米，登顶鸟瞰，凭海临风，正南方有闻名遐迩的旅顺军港，东侧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国家工业遗产——旅顺大坞，西侧可见辽远的天然防波堤老虎尾半岛，远观海天相连的黄海和雄伟起伏的国家自然保护区老铁山，景区风光尽收眼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先后五次来到旅顺口，三次登上白玉山，对国家要塞旅顺港寄予殷切的期望。

1953年2月，周恩来总理到旅顺口参加苏军建军35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第一次登上了白玉山。1962年6月4日，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陪同柬埔寨宾努亲王访问旅顺口，第二次登上白玉山。1973年7月31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刚果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少校登上白玉山，他是应周总理邀请参观旅顺军港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元首。尽管在白玉山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周恩来总理依然惦记着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不时向陪同的地方领导询问大连的人口、下辖县、水库等情况。

如今的白玉山，成为外地游客到旅顺口观光首选必游之地，每当游人登上白玉山时，导游们都要领着大家到周恩来总理曾经站过的地方俯瞰军港小城，追思敬爱的周总理。

